

從《漢語史稿》看王力的語料觀

王魁偉

《漢語史稿》是中國第一部漢語史專著，具有里程碑意義。該書問世已近半個世紀，曾多次加印和重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收入《王力文集》（第九卷），是《文集》中為數不多的經先生生前親自審閱整理過的一部著作。

《漢語史稿》一書體大思精，幾乎涉及到漢語史的所有問題。本文僅就其中與語料問題有關者，略窺王先生的語料觀並附述筆者的一些淺見和思考，請方家指正。

語料問題與漢語史研究息息相關，可以說沒有可靠而時代確切的語料的支持，漢語史的研究將寸步難行。《漢語史稿》是較早關注此一問題的著作，作者不但提出了要“認真地審查研究的對象”及“要辨別史料的時代”的標準，而且始終注意貫徹其語料觀。這一寶貴學術遺產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

在《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中，作者指出：“所謂認真地審查研究的對象，就是要辨別史料的時代。古人喜歡‘托古’，因此產生了一些‘偽書’，古人已經做了許多‘辨偽’的工作，漢語史研究者在這方面至少要有一些常識。有些書雖然不是‘偽書’，但是我們不應該以書中所敘述的時代為標準，而應該以著書的時代為標準。書中所敘述某一個古人的談話，也不能輕信為那古人當時的語言。”^①這一語料觀概括來說有兩個基本點：要注意語料的真偽：語料斷代應以著書時代為標準。這些觀點的提出

與當時漢語史研究中存在的帶有傾向性的問題有關。如有人把偽古文《尚書》當作三代語言史料，把《洞冥記》《十洲記》《神異經》等偽書當作漢代語言史料^②；還有人用《大正藏》明版的唐代禪宗語錄研究唐代語言，用《京本通俗小說》研究宋代語言，用臧晉叔明末所編的《元曲選》里的賓白研究元代語言^③。因此，可以說王力語料觀的提出最初是有一定的針對性的，這對糾正語料問題上的種種偏差，確保漢語史研究的質量，無疑具有理論指導意義。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處理語料問題的重要原則和根據。

實踐表明，漢語史研究中的語料問題相當複雜：即以斷代而言，沒有一個統一的斷代標準，勢必出現言人人殊的局面，如關於《晉書》的語料年代，目前就有多種說法^④。而一旦有了某種標準，又難以避免片面和不足，王力語料觀也是如此。

早在《漢語史稿》問世後不久，即有人對王力語料觀提出“商榷”。其中包括：對史料的處理有不夠妥當的地方；把某些語言現象的產生時代說得太遲；著書時代不能作為辨別一切史料的時代標準；材料取捨不能一律以數量多少為標準；對材料既要辨別真偽，又要從各方面選擇利用等^⑤。王先生對此十分重視，並曾虛心接受了其中的一些意見^⑥。

在《漢語史稿》一書中，王力不僅較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語料觀，而且處處可以看到他貫徹其語料觀的實踐。他對研究對象的審查十分慎重，在談到漢語係詞產生的時代時，他指出：“《史記》裏也有一些係詞，如《豫讓傳》：‘此必是豫讓也。’但是《史記》有經後人改動的地方，這類例子又少，為謹慎處理材料起見，未敢拿來作為證據。《穀梁傳》有不少係詞‘是’字，因此書年代未能考定，也不採用。”對所謂“偽書”的問題也很審慎，在談到關於上古人稱代詞的形態問題的研究方法時，他曾提到四個方法，其中即包括“排除偽書”。在談到詞頭“阿”字的

用法時說：“它作為人名的詞頭是從小字（小名）開始的。《漢武故事》說武帝的后小字阿嬌，這還不一定靠得住，因為《漢武故事》是偽書。”在談到係詞“是”的歷史發展時，曾用過一則《西京雜記》中的語料來證明“是”在中古時期的用法，對此他在腳注中解釋說：“《西京雜記》偽托劉歆，其實是梁吳均的作品。”

總的來看，王力在語料問題上還是相當慎重的。不過，其語料觀及其實踐也的確存在某些不夠完善之處，需要補充和糾正。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商榷”者外，語料的版本問題也應成為斷代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再有就是關於“偽書”的語料價值，也應重新進行認識。例如關於《黃帝內經》的語料年代，有人祇片面強調該書的存在爭議的成書年代，而忽視該書後世版本變化影響其語料時代的事實，從而得出令人難以信服的結論^⑦。在對待“偽書”的問題上，採取一概“排除”的態度，顯然是不足為訓的。事實上王先生自己也沒有完全做到，在其他場合他還引用過偽古文《尚書》中的語料^⑧。由是觀之，在“偽書”的語料問題上，尚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⑨。

下面再結合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談談。

(1) 爲了證明“在整個上古時期，‘再’字始終祇有‘兩次’的意義，沒有‘復’的意義”，《史稿》的作者共列舉了十四個例子，其中包括“李陵詩”一例。顯然作者是將其視爲上古時期的語料的，而關於“李陵詩”的真偽問題，學術界卻一直有爭論。據考，關於該詩的寫作年代，目前即有東漢、魏晉、東晉、齊梁等多種說法^⑩。唐代劉知幾即斷然否定世間流傳的所謂李陵作品，其後歷代學者對該詩的真實性也大多持否定態度。退一步說，即使將真偽問題擱置起來，而以該詩最早始見於《昭明文選》論，按以著書時代斷代說，以該詩語料來證明上古漢語史問題，其說服力也是要打折扣的。

(2) 《漢語史稿》中曾多次引用過唐代禪師語錄中的語料。“據不完全统计，從唐到清，禪宗語錄不下三百餘種。主要保存在各種版本的漢文大藏經中。”^⑩而其中出自《大正藏》明版的唐代禪宗語錄，經有關專家考證是研究唐代語言的“不可靠的資料”^⑪。我們注意到《漢語史稿》所引用的唐代禪宗語錄在斷代上前後有變化，舊版視為唐代語料，新版（即收入《王力文集》第九卷者）則看作唐代以後語料。值得注意的是新版《史稿》將舊版中轉引自高名凱《唐代禪家語錄所見的語法成分》中的八條禪宗語錄材料全部刪掉，改換成敦煌變文等時代更為確切的語料。由此我們看到王力先生在語料問題上不斷探索、精益求精與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

(3) 關於《爾雅》一書的成書年代，《漢語史稿》中說：“這部書的完成一定在漢武帝提倡經學之後，而且是經過許多人補充的。但《漢書·藝文志》裏已有《爾雅》，那麼，《爾雅》的成書也必在西漢。”^⑫對此，有人批評說：“《爾雅》是一部重要的漢語史資料書。討論這部書著作時代，衆說紛紜。謂作於西漢則最誤。”^⑬其理由是：《爾雅》在漢武帝時即與《論語》《孝經》《孟子》同立博士，且當時已有人為該書作注解，這表明如果認為《爾雅》遲至漢武帝時纔成書，那麼上述兩點均將無法解釋。

王先生對《爾雅》成書年代的推斷有兩個基點：其一是認為《爾雅》一書是為解經而作，由此推導出其成書一定要在漢武帝提倡經學之後；其二是認為《漢書·藝文志》中已有《爾雅》，由此推導出其成書必在西漢。關於前者目前學術界看法不一，此屬一家之言，這裏暫不討論。而關於後者則似有可商。我們知道，《漢書·藝文志》所載並非僅是有漢一代的書目文獻，而是一部漢以前六藝百家文獻的總目錄。因此，根據《爾雅》見於《漢書·藝文志》這一點，祇能說該書的成書下限在西漢，或說其成書可能在西漢，而不能說必在西漢。在這里應該指出：以著書時代為

標準進行語料斷代，不能簡單地以《漢志》類的書目著錄與否為根據。同樣，書目類文獻的成書年代與所著錄的書籍的成書年代，也不應相提並論。

(4) 有人批評《漢語史稿》“把某些語言現象的產生時代說得太遲”^⑥，如關於“條”字成為量詞，動量詞及名量詞詞尾化的出現時間及連詞“所以”產生的時代等。如果追溯其原因，那就不能脫離其語料觀。王先生在確定某種語言現象的產生時代時，一貫反對憑“孤證”下結論，而比較重視其是否“常見”。如關於人稱代詞“吾”字作賓語的用法，本來戰國時代已有可靠用例，到了漢代《史記》中也有用例，但例子很少。於是《史稿》即認為“這種結構應該算入中古時期”，理由是“到了中古時期，這種情況就更為常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源自“例不十，不立法”之說^⑦，王先生甚至還補充一句，就是“例外不十，法不破”。他認為這是區別一般和特殊而符合辯證法的原理，“這個原理非常重要，假使同時代一切史料都沒有這種語言現象（語法結構形式等），祇有一部書中有這種現象，這部書就有被證明為偽書的可能。”^⑧由此我們再一次看到了王力先生在語料問題上的嚴謹與慎重。

關於漢語史研究中語料的量化問題，看來還有討論的空間，這牽涉到語料的合理開發利用及相關語言現象出現時代早晚的問題。如果機械地按“例不十，不立法”來進行研究，就有可能使某些代表新興的語言因素，祇是因為一開始出現的時候數量較少，而得不到正確的認識。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什麼纔是偶然的例外呢？凡是出現的次數既少而又沒有發展的東西纔是偶然的例外。至於出現的次數雖少，而發展的勢力卻旺盛不可遏制，這正是新興的語言因素，不是偶然的例外。凡新興的事物總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新興的語言因素在發展的初期，在古代進入書面語，數量少是正常現象。”^⑨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關於人稱

代詞“吾”用作賓語的時代，既然戰國時代已有可靠用例，而且到了漢代的《史記》中也有用例，那麼，完全有理由據此將該用法的出現時代定在上古。以“常見”為由將其出現時代“算入中古時期”，確實“時代相差太遠”。再如關於連詞“所以”產生的時代，《漢語史稿》認為是在“唐代”。其後學術界陸續出現南朝說、晉代說、甚至西漢說等多種新說^①。當然，這些說法也不見得都能站得住腳，但從《抱朴子》《世說新語》及《文心雕龍》等唐前語料中已有較多連詞“所以”的用例來看，將其出現的年代定在“唐代”，確實有些偏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王力先生的語料觀，那就是：審慎。這是老一輩學者優良學風和治學經驗的結晶，應成為我們繼續研究和探索的基石。儘管王先生所提出的語料鑒別與斷代的標準，在今天看來還不夠完善；其語料觀及其實踐，還存在某些可商可補之處，但這些絲毫無損於先生在這一領域導夫先路和奠基之功。我們還將不斷地從先生留給我們的理論寶庫中得到有益的啓迪和指導，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注釋〕

①見《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第三節漢語史的研究方法、該引文腳注中說：“例如范曄著《後漢書》，范是南朝宋時人，《後漢書》不能代表宋代的語言。《三國演義》敘述劉備、曹操等人的話，都不能代表三國時代的語言。劉備三顧茅廬時留給諸葛亮的信，諸葛亮隆中高臥的詩等，也不能代表當時的語言。”

②見張永言《從“聞”的詞義說到漢語詞源學的方法問題——追答故傅東華先生》，載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二十二輯《漢語論叢》。

③見梅祖麟為《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匯編》所作“序”。

④關於《晉書》的語料年代，據筆者所知即有：六朝說，唐代說及折中說，其中“折中說”又可細分為三種意見。詳見拙稿《關於〈晉書〉的語料年代》。

⑤見洪誠《王力〈漢語史稿〉語法部分商榷》，載《中國語文》1964年第3期，又見《關於漢語史材料運用的問題》，載《洪誠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⑥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冊語法部分的一條腳注中說：“我一向以爲係詞始於東晉，盛於南北朝。1956年夏天，洪誠先生對我說，《論衡》裏有許多係詞的例子。我因此得以修正我的結論，謹此致謝。”

⑦見拙文《所以+主謂式已見於〈黃帝內經〉補疑》，載《中國語文》1993年第6期。

⑧見王力《漢語語法史》第十章介詞和連詞189頁腳注①，載《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⑨一般認爲從東漢到隋所謂中古漢語時期的語料相對欠缺，而恰在此時所謂的“偽書”又偏多，如《孔子家語》《列子》及《尚書》僞孔傳等，這些“偽書”尚有可利用的價值。筆者將另有專文討論。

⑩見劉躍進《有關〈文選〉“蘇李詩”若干問題的考察》，載《結網漫錄》，學苑出版社1997。

⑪見方廣錫《佛教典籍百問》，今日中國出版社1989。

⑫同③。

⑬見《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第二節中國歷代學者對漢語史的貢獻。

⑭見洪誠《關於漢語史材料運用的問題》。

⑮見洪誠《王力〈漢語史稿〉語法部分商榷》。

⑯見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原序。

⑰見《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第三節漢語史的研究方法。

⑱同⑮。

⑲同⑦。